

百年国士

九五更頌廷龍題

自述·回忆·专访

王大鹏 / 选编 丁聪 / 绘画

酒旗风暖少年狂
风号大树中天立
楚天辽阔一诗人
千秋付与如椽笔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90201029

王大鹏 / 选编
丁 聪 / 绘画

自述·回忆·专访

百年国士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九五叟 頌廷龍題

目 录

鲁 迅(1881—1936 年)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鲁迅先生的母亲谈鲁迅先生 | 俞 芳(18) |
| 最后一天 | 景 宋(25) |
| 同鲁迅先生最后的晤谈 | 许钦文(30) |
| 悼鲁迅 | 林语堂(36) |
| 回忆鲁迅 | 郁达夫(39) |
| 怀念鲁迅先生 | 巴 金(60) |

马一浮(1883—1967 年)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陋 巷 | 丰子恺(72) |
| 马一浮 | 张中行(77) |

苏曼殊(1884—1918 年)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亡兄苏曼殊的身世 | |
| ——致罗孝明先生长函 | 苏惠珊(91) |
| 亦诗亦画话曼殊 | 柳无忌 刘昭明译撰文(99) |
| 一代奇才苏曼殊香港侧记 | 刘小清(118) |

熊十力(1885 -1968 年)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有关熊十力先生生平的只鳞片爪 | 徐复观(140) |
| 在熊十力先生追念会上的讲话 | 牟宗三(148) |
| 熊十力杂忆 | 钱穆(164) |
| 怀念熊十力先生 | 冯友兰(168) |
| 熊十力 | 张中行(170) |
| 熊十力二三事 | 王元化(175) |

沈兼士(1887 1947 年)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敬怀沈兼士先生 | 公孙媵(187) |
| 记恩师沈兼士先生 | 张秀亚(196) |
| 怀念尊敬的恩师沈兼士先生 | 周祖谟(200) |

李大钊(1889—1927 年)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《守常全集》题记 | 鲁迅(216) |
| 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 | 高一涵(219) |
| 忆守常 | 张申府(225) |
| 回忆李大钊先生 | 梁漱溟(231) |

陈寅恪(1890 --1969 年)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王观堂先生挽词序 | 陈寅恪(243) |
|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| 陈寅恪(245) |

回忆我家逃难前后

- 记先父陈寅恪教授抗战前后教书生涯 陈流球(246)
- 谈陈寅恪先生 俞大维(257)
- 忆陈寅恪先生 劳 幹(266)
- 记陈寅恪先生 毛子水(272)
- 怀念陈寅恪先生 冯友兰(275)
- 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羨林(278)

刘半农(1891·1934年)

回忆我们的父亲

- 刘半农先生 刘小蕙 刘育伦 刘育敦(297)
- 忆刘半农君 鲁 迅(308)
- 半农纪念 周作人(311)
- 刘半农 张中行(315)

胡 适(1891—1962年)

- 致鲁迅、周作人、陈源 胡 适(333)
- 胡适大博士 郭沫若(336)
- 最后的酒会 风 舟(340)
- 记一代学人胡适博士的死 叶公超(348)
- 深夜怀友 苏雪林(351)
- 寒风凄雨哭大师 胡颂平(356)
- 我当了四年的学徒 梁实秋(364)
- 胡适先生二三事 王忘维(371)
- 记胡适先生去世前的谈话片段

4 百年国士

- 胡适杂忆 钱穆(376)
胡适与北京大学 邓广铭口述 苏敏整理(382)
回忆中的胡适先生 冰心(394)

赵元任(1892—1982年)

- 和一个男青年(节选) 杨步伟(405)
西天还有些儿彩霞(节选)
——给爸爸朋友的一封信 赵如兰(415)
回忆往事
——纪念赵元任院士 杨时逢(418)
赵元任夫妇二三事 王东明(423)

顾颉刚(1893—1980年)

- 《北京岁月》(节选) 顾颉刚(433)
杂忆顾颉刚先生 吴锡泽(440)
悼念颉刚 郭绍虞(454)

梁漱溟(1893—1988年)

- 谨记先父梁漱溟 梁培恕(471)
真正的人物 唐君毅(477)
梁漱溟杂忆 钱穆(481)
“仲尼燕居”
——悼念梁漱溟先生(节选) 袁鸿寿(483)

风号大树中天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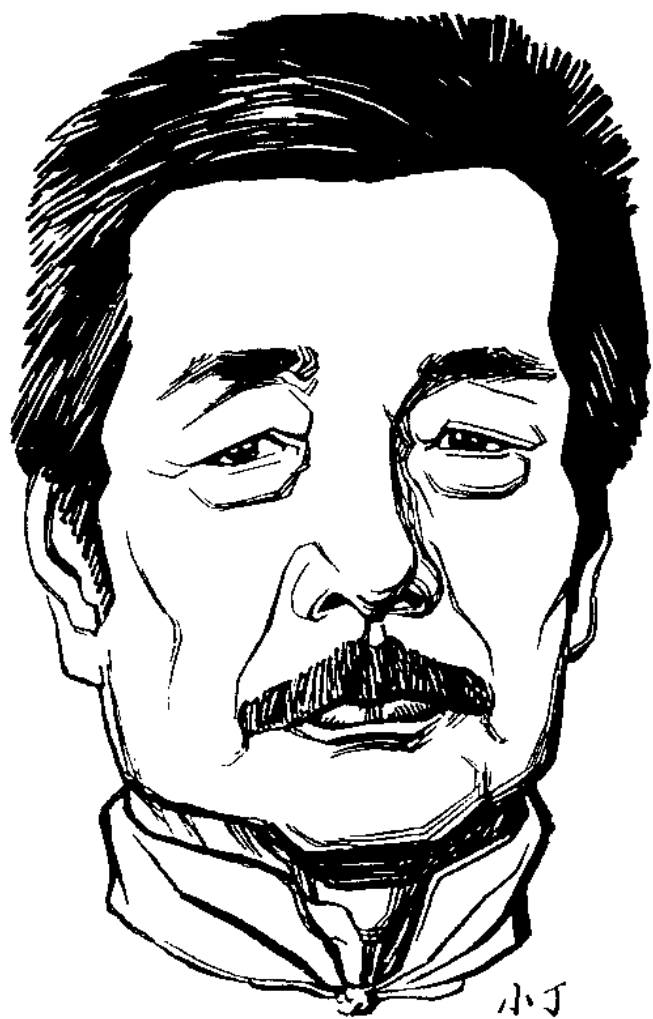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梁漱溟先生访问记 任 华 驰 方(497)

吴 宓(1894—1978年)

最后的会面(节选)	吴学昭(520)
吴宓先生	温源宁(527)
回忆雨僧先生	季羨林(530)
吴宓先生与钱钟书	杨 绛(533)

叶圣陶(1894—1988年)

过去随谈	叶圣陶(546)
关于父亲	叶至诚(553)
我所见的叶圣陶	朱自清(560)
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	冰 心(564)
海棠花下	
——和叶老的末一次相见	冰 心(566)
怀念圣陶先生	吕叔湘(568)
难忘怀的一杯酒	刘心武(575)



魯 迅

鲁 迅

鲁迅(1881—1936年),浙江绍兴人。原名樟寿,字豫才,后改名树人。“鲁迅”是1918年发表《狂人日记》时,所用笔名。另有夏剑生、隋洛文、唐俟、迅行、申飞、何家干、孺牛、越山、且介等190余个笔名。祖父周介孚(1837—1904年),又名福清。清同治十年(1871年)进士,曾任翰林编修、江西金溪县知县。1893年因科场行贿案下狱,在杭州关押8年,1901年1月获释,1904年病逝。父周伯宜(1860—1896年),秀才,有维新思想。后患水肿病,36岁即去世。母鲁瑞,出生农家,由于自修获得了能够看书的能力。二弟周作人(1885—1967年),原名魁寿,字星勺。后改名奎寿、启明、岂明、作人,字起孟,号知堂,晚号苦茶庵老人。笔名仲密、药堂、周遐寿等。曾留学日本习法学、土木工程。后任北京大学教授,曾参加《新青年》、《新潮》杂志编辑工作。抗战时期,曾任伪职。著有《自己的书》、《雨天的书》、《鲁迅的故家》、《鲁迅小说中的人物》、《知堂回想录》等。三弟周建人(1888—1984年),原名松寿,字乔峰。笔名克士、松山、嵩山等。曾在北京大学旁听。后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辑,上海大学、暨南大学教授,浙江省省长,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,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。曾任第9、10届中共中央委员。著有《生物学》、《动物学》、《植物学》等。

鲁迅因家道中落，深感世态炎凉，“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涂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。”（《呐喊·自序》）幼时常和母亲到乡下外婆家，因而熟悉农村。7岁入家塾从周玉田诵《鉴略》，12岁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习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。1898年决心“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”（《呐喊·自序》）。带着母亲筹来的8元路费，到南京，考入免费的水师学堂，次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之矿务铁路学堂。这时开始接触“新学”，和鼓吹维新思想的书刊，其中最喜欢读严复所译的《天演论》（英·赫胥黎著），他从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中，确立了将来必胜于过去，青年必胜于老年的发展观点。

1902年1月，随总办俞明震，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留学，先入东京弘文学院习日语。次年，剪辫后拍照留念，作《自题小像》诗：“灵台无计逃神矢，风雨如磐暗故园；寄意寒星荃不察，我以我血荐轩辕。”曾师事民主主义革命家、国学大师章太炎，与革命派人物陶成章等往来。1904年加入光复会。弘文学院毕业后，于1904年秋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。受到教师藤野严九郎的关怀。在校观幻灯片，放映日俄战争时，一中国人被日本军人以俄国侦探罪名砍头示众的情景，围观中国看客却露出麻木神情。遂省悟到：“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……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”（《呐喊·自序》）遂断然弃医从文。1906年到东京，与苏曼殊等筹办《新生》杂志（未成功），后撰写《人的历史》、《科学史教篇》、《文化偏至论》、《摩罗诗力说》等论文，发表于《河南》杂志。在日本受到尼采的“贵力尚强”学说、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，以及章太炎“以国粹振兴民族精神”等思想的影响。日本7年，鲁迅成为

4 百年国士

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热烈的爱国主义者。在《文化偏至论》一文中，曾热情呼唤新的中华：“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，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，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，人生意义，致之深邃，则国人之自觉至，个性张，沙聚之邦，由是转为人国。人国既建，乃始雄厉无前，屹然独见于天下。”这种对人的“个性”的珍视，对“人国”的不倦追求，是鲁迅早期文化意识的精髓所在。

1906年6月，在母亲催促下，由日本返回绍兴。7月26日与朱安（1877—1947年）结婚，朱安出身富家，住绍兴城内丁家弄，是年28岁。鲁迅对母亲包办的婚姻甚不满意，曾对许寿裳说：“这是母亲送给的礼物，只能好好供养她。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。”婚后只4天即返回东京。1919年鲁母到北京，朱安侍奉在侧，掌管家务，直到鲁母1943年去世。鲁迅称朱安为“妇”、“内子”，仅为名义夫妻。朱安病逝于1947年6月29日，周作人长子周丰一将其安葬于京西板井村。

1909年6月，鲁迅由日归国，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化学及生理学教员。该校监督（校长）为沈钧儒，监学（教务长）为许寿裳。次年秋，回绍兴，任绍兴府学堂监学，兼任博物学、生理学教员。1912年2月，应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，到南京教育部任职。

1912年5月，随教育部至北京，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院内之“藤花馆”，1916年5月移住同院“补树书屋”，至1919年11月鲁母到京，始迁居八道湾、砖塔胡同、宫门口西三条（今辟为“鲁迅故居”，其右设“鲁迅博物馆”）等处。鲁迅在教育部，前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，8月改任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，主管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美术教育等事项。鲁迅“见过辛亥革命，见过二月革命，见过袁世凯称帝、张勋复辟，眷来看去，就看得怀疑起来，颓唐得很了”。于是业余以抄录碑帖、校辑古籍自

遣，曾辑录《谢承后汉书》8卷，纂辑《唐宋传奇集》，校录《稽康集》等。

1918年初，在新时代的“风云”中，起而参加以陈独秀为首的《新青年》编委会。在友人钱玄同“可以做点文章”的鼓励下，5月在《新青年》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旨在暴露“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”，断言中国社会史就是“人吃人”的历史，发出“救救孩子”的呼声。从此“一发而不可收”，陆续发表《孔乙己》、《药》、《社戏》、《故乡》、《风波》、《阿Q正传》等作品，在鲁迅笔下，破产的乡村和败落的市镇，潦倒的文人、衣食无着的贫民，和被压在底层的劳苦农民，他们的挣扎和呼号，构成一幅幅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景观。鲁迅自称其作品是“遵命文学”，“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”，而以“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”，显示了“‘文学革命’的实绩”。其中连载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《晨报·副刊》的中篇小说《阿Q正传》，更使新文学升堂入室，在中国文学的历史画廊中得与屈原、李杜、《红楼梦》并列，“说不完的”阿Q，同时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典型。鲁迅是第一个触及“国民的弱点”这一重大社会课题的中国作家，他的阿Q，以文学形象“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”（《俄文译本〈阿Q正传〉序》），画出其中的历史惰性——“精神胜利法”，而“第一要著”是“改变他们的精神”（《呐喊·自序》），是迎接一场使“国人之自觉至，个性张”（《文化偏至论》）的文化变革。《阿Q正传》是一部“人学”经典，奠定了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地位，并使鲁迅获得世界性声誉。《狂人日记》、《阿Q正传》等14个短篇小说，在1923年8月结集为《呐喊》出版。

五四前后，鲁迅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，为着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，为着“对于有害的事物，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”（《〈且介亭杂文〉序言》），创造了人们称之为“匕首”或“投

枪”的新文体——杂文。杂文“萌芽于‘文学革命’以至‘思想革命’”时期（《小品文的危机》），最早是1918年发表在《新青年》上的《随感录》，继之有《我之节烈观》、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、《娜拉走后怎样》、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、《灯下漫笔》、《论睁了眼看》等，在这些杂文中，鲁迅重申《狂人日记》中的命题：在中国“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，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，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，被吃……”“扫荡这些食人者，掀掉这筵席，毁坏这厨房，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。”而启蒙者的鲁迅则“用无我的爱，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。”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；此后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。”后结集为《热风》（1925年11月出版）和《坟》（1927年3月出版）。

从1920年8月至1926年8月，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、中国大学和世界语专门学校、集成国际语言学校、黎明中学、大中公学等校兼课，任讲师或教员，讲授“中国小说史”、“小说”、“新文艺”等课程，并和青年学生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和亲密的情谊，从这一时期起，鲁迅就成为进步青年爱戴的朋友和导师。1923年12月4日出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

五四落潮期，鲁迅组织了语丝社，出版《语丝》周刊（1924年11月—1930年3月，孙伏园、周作人、鲁迅、柔石、李小峰先后任主编，撰稿人还有川岛、刘半农、章衣萍、林语堂、钱玄同等），主张“任意而谈，无所顾忌，要催促新的产生，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，则竭力加以排击”。后又与李霁野、台静农、曹靖华、韦素园、韦丛芜等组织未名社（1925年8月—1933年春）和莽原社，编辑和出版《莽原》半月刊（1925年4月—1930年4月，鲁迅主编），主旨是“率性而言，凭心立论，忠于现世，望彼未来”。

1924年至1925年，鲁迅继续写作短篇小说，有《祝福》、《在酒楼上》、《孤独者》、《伤逝》、《离婚》等11篇，1926年8月，在“两间余一卒，荷载独彷徨”的苦闷和寂寞中，编成第2本短篇小说集《彷徨》出版，以期“揭出病苦，引起疗救的注意”（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）。《祝福》，1924年3月发表于《东方杂志》。穷苦的农村寡妇祥林嫂，在鲁镇的鲁四老爷家做佣工。后来被婆家人捆起来卖到山里去，丈夫贺老六不久断送在伤寒病上，三岁多的孩子又让狼叼走了，只好再回到鲁四老爷家帮工。因为嫁过两次，被周围的人视为“不祥之物”，鲁家祭祖的时候，不让她沾手。柳妈诡秘地告诉她：“你将来到阴司去，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，你给了谁好呢？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，分给他们。”解救的办法是到土地庙里捐一条门槛，当作替身，“给千人踏，万人跨，赎了这一世的罪名”。祥林嫂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12元鹰洋，果真捐了门槛。又到了冬至的祭祖时节，“她便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。‘你放着罢，祥林嫂！’四婶慌忙大声说。她好像受了炮烙似的缩手，脸色同时变作灰黑，……”在绝望中，她“总惴惴的，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，否则呆坐着，直是一个木偶人”。她被打发走了，沦为乞丐，切切地追问着“一个人死了之后，究竟有没有灵魂的？”带着这个谁也“说不清”的疑问，终于“穷死”在“祝福”的爆竹声中。祥林嫂在阴阳两界都没有做人的资格，肉体的摧残继之灵魂的掠夺，神权、君权、族权、夫权严酷而精致地铸就着古老的中国——闷死人的“一间铁屋子”。《祝福》的美学风格是它的“重压之感”（《〈自选集〉自序》），表现着鲁迅小说艺术的独特性和难以企及的感染力。

1924年至1926年间，作散文诗23篇，1927年7月结集为《野草》出版。自称“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，当然不会美丽”（《〈野草〉英文译本序》1932年）。面对“旧战场”，

鲁迅说：“我的心分外地寂寞。”但他仍相信“地火在地下运行，奔突；熔岩一旦喷出，将烧尽一切野草，以及乔木”。于是他歌唱不死的战斗者：“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；他屹立着，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，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，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凝血，深知一切已死，方生，将生和未生。”（《淡淡的血痕中——纪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》）他渴望战斗：“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——……他走进无物之阵，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。……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，绣出各样好的名称：慈善家，学者，文士，长者，青年，雅人，君子……。头下有各样外套。绣出各式好花样：学问，道德，国粹，民意，逻辑，公义，东方文明……。但他举起了投枪。”（《这样的战士》）《立论》、《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》等名篇，鞭挞市侩主义，入骨三分。《秋夜》、《风筝》、《好的故事》、《过客》等，在苍凉、沉郁中蕴涵着深邃的哲理。散文诗这一五四后的新文体，同杂文一样，首创于鲁迅，也在鲁迅手中达到其艺术高峰。

1925年，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，为教育部免职。1926年“三一八”惨案后，作《纪念刘和珍君》，说：“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，是一件事的开头。墨写的谎话，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。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，拖欠得愈久，就要付更大的利息。”因此被列入段祺瑞执政府通缉名单，遂于8月26日偕许广平南下。这一时期所作，多为反对帝国主义、北洋军阀的战斗檄文，后结集为《华盖集》（1926年6月出版）和《华盖集续编》（1927年5月出版）。

1926年9月抵厦门，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，讲授“中国小说史”和“中国文学史”。本年2月至11月，作散文《阿长与山海经》、《二十四孝图》、《无常》、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、《父亲的病》、《藤野先生》、《范爱农》等10篇，“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”

(《朝花夕拾·小引》),篇中“反顾”“旧来的意味”,有对故乡和童年的回想,有对“人间至爱者”的眷恋,笔下流溢着无限的爱,柔情,和淡淡的感伤。这些文章结集为《朝花夕拾》(1928年9月出版),是怀旧散文的珍品,给予几代青少年的读书生活以特殊的美的享受。

1927年1月赴广州,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。同年4月15日广州政变,曾多方营救被捕学生,无效后愤而辞职。8月,作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(收入《而已集》)。本年编定《汉文学史纲要》(1938年列入《鲁迅全集》第10卷出版)和杂文集《而已集》(1928年10月出版)。

1927年10月到上海,与许广平(1896—1968年,广东番禺人,字景宋。1923年就学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,曾在《莽原》半月刊发表文章。1924年驱杨——荫榆——期间,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总干事。1925年3月开始与鲁迅通信,其来往书信后来编为《两地书》,1933年出版。与鲁迅南下后,先到广州,任广东省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。鲁迅到中山大学后,任鲁迅助教。时常馈赠食物,鲁迅颇不安,许则戏曰:“这不要紧,我家的钱,原取之浙江——许祖父曾任清浙江巡抚……,现用之于浙江人,恰得其所。”鲁迅逝世后,与郑振铎等组织“复社”,致力刊行《鲁迅全集》。1941年曾遭日军拘捕。1945年冬,与马叙伦等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。1949年3月,任全国妇联副主席,1954年,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。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著有《欣慰的纪念》、《鲁迅回忆录》等)结婚。1929年9月独子海婴诞生。

1928年6月,与郁达夫合编《奔流》月刊。11月,与柔石等组织“朝花社”,介绍东、北欧文艺,倡导新兴木刻艺术,出版《朝花周刊》和《朝花旬刊》。

1927—1929年作杂文34篇,多为与创造社、太阳社、新月社

的论争文章，集为《三闲集》（1932年9月出版）。其中1928年4月的《文艺与革命》一文指出“一切文艺固是宣传，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，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（我将白也算作色），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”。8月的《文学的阶级性》一文说到：若根据人的性格感情等都受“支配于经济”，则“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。但是‘都带’，而非‘只有’。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，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，也不相信住洋房，喝咖啡，却道‘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，所以我是真正的无产者’的革命文学者。”在这两篇文章中，鲁迅就当时文艺论争中的文学观念、文学的功能，以及人性与阶级性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个人看法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承认人的共同性，即人性的存在。

1927年10月，在上海劳动大学曾作《关于知识阶级》的讲演，说：“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？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，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性呢？要是发表意见，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，如想到种种利害，就是假的，冒充的知识阶级”，“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，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，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，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，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，……”（《集外集拾遗》，1938年收入《鲁迅全集》出版）这是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，及其悲剧命运的重要论述。

1930年元旦，与冯雪峰创办的《萌芽》月刊（1930年1月—6月。后曾作为“左联”机关刊物，柔石、魏金枝参与编务）出版。2月13日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。3月2日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，并发表《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》。忠告说：倘若“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”，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”，那么“‘左翼’作家是很容易成为‘右翼’作家的。”并提出“左联”今后应注意的三点：“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，必须坚决，持久